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六六期 ——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8d)

【往事如烟】	“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叶志江
【文献资料】	在武汉市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1967.10.19)	周恩来
【书刊评论】	好一个“小兵”金敬迈	李南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往事如烟】

### “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 叶志江 •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总部”，俗称“团派”。另一派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沈如槐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414总部”，俗称“414派”。两派的人员则分别称为“老团”和“老四”。

清华大学几万名师生员工中绝大部分人，或因政治观点的不同，或因个人的经历地位等不同，甚至因同学间关系的亲疏和其它一些偶然因素而分属两派。在两派发展的鼎盛期，团派号称拥有一万多人，而414派号称拥有七、八千人。

1968年4月23日，两派学生在打了一年笔墨官司后终于兵戎相见，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

这场武斗夺去了十多个年轻的生命，也为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

文革前，我是清华大学树立的“又红又专”标兵。我的“事迹”曾刊登在全国十几家报纸

上。文革伊始，我即遭批判。

1966年6月13日，我第一次被学生揪出去带高帽子批斗。因为我“不老实”，故意弄坏三顶戴在我头上的纸帽子，数力系的一个学生将一个装了墨汁的痰盂扣在我的头上。我从头到脚都被泼上了墨汁，真正成了一个“黑人”。

我悲愤莫名。但就在此时，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低年级学生陈育延眼中充满了同情的眼光，使我心中生出很大的安慰。

1966年8月8日，陈育延和唐伟发起成立“八八串联会”，成为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红卫兵领袖”。我和陈育延从无交往，但那个“同情的眼光”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年后，我们因一个偶然的会而戏剧般地相恋。

这“红”与“黑”相恋的花边新闻让清华园里许多人大跌眼镜。

在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我和陈育延没有投身于“正面战场”，而是客串了一个被人称之为“英雄救美”的武斗插曲。这次“客串”，虽说很冒了一点生命危险，但在日后却成为一段佳话，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已经或打算写入他们的书中。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对这件事的解读也就相异。红卫兵领袖沈如槐看到的是清华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注一）；大学教授曾昭奋看到的是文革对科学的亵渎（注二）；而女性的感触又使得黄肖路和杜欣欣两位女士更关注事件的爱情层面（注三）。

当我回顾这段往事时，我最大的感受却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倘若要给清华文革留下一点什么真相的话，或许我因“救美”而身陷科学馆黑牢的遭遇可以为“清华百日大武斗”中的个人命运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1968年5月中旬，我从内蒙回到已成为武斗战场的清华园。当我找到陈育延时，她立即告诉了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我们这一派（团派）的人活活打死了414派一个叫孙华栋的学生。我们两人本来就反对武斗，这件刚发生的事更使我们感到武斗的残忍。陈育延是团派的总部委员，但她决定宁可不要这顶“乌纱帽”，也不参与武斗了。

5月19日，我们准备离开清华回家。临走前，陈育延将一个装有十几本日记的书包放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当我推着自行车和她走到大礼堂时，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通向校门，右手一条路要经过414派占领的科学馆，而左手一条路则是经过团派的据点。

我和陈育延开玩笑：“敢不敢从右面这条路走？”

不料我的这句玩笑话竟使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当时，诺大清华园里几无行人。我们在右边的路上走了没有几步路，就被科学馆屋顶上放哨的人发现。好在武斗初期，双方都还没有真枪真炮，使用的都是人类最原始的武器。屋顶上的人用大弹弓将拳头大的石头向我们射来，以示警告。

陈育延性格刚烈，几块石头反而激怒了她，不肯接受我后退的建议。

当我们走到科学馆大门时，十多个手持长矛的武斗人员从大楼南侧的小路上冲了出来，对

我们形成半圆形的包围圈。因为双方相距只有几步之遥，陈育延自知已无法脱身，便要我骑车快跑，说书包里的日记绝不能落在老四的手里。

我自然清楚她的日记的重要性。这十几本日记里不仅有团派总部历次会议的记录，也有她搜集的反康生材料和孙华栋被打死的有关情况。当然，日记里还有大量不能公开的个人隐私。这些日记要是落到老四的手里，势必会在清华园成为十分轰动的新闻，并给团派和陈育延造成很大伤害。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已容不得我去考虑其它可能的选择。为了保护这些日记，我只能眼看着女友落入“敌手”。我迅速对陈育延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便骑车跑了。

我十分看重情义和个人名节，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接受独自逃脱的结局。三天后去科学馆救陈育延是我既保护日记又不失情义和个人名节的两全之计。

我并不奢望我真的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将陈育延从铁壁重围中救出。但我的“自投罗网”，至少可以证明我并非不管他人安危，临阵脱逃的懦夫。

然而，孙华栋尸骨未寒，4月14日派全体将士个个义愤填膺。这时候我去自投罗网，无异于去自杀。

5月22日，时近黄昏，夕阳西下，在落日的余晖笼罩下，清华园里一片肃杀之气。在《井冈山报》编辑部大门上留下“遗书”后，我一步一步地走向科学馆的大门，颇有一种走向刑场的感觉。

大门口放哨的卫兵认出我是叶志江后，很是惊讶，问我有什么事。我指着背在肩上的书包说：“我给陈育延送衣物。”卫兵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所以很和善地对我说：“你将东西留下，我帮你交给陈育延。”我回答他：“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他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他要请示领导。

几分钟后，科学馆的“卫戍司令”陈楚三出现在大门口。

这陈楚三在清华园里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父亲陈潭秋是出席中共一大的12个代表之一。1943年，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在乌鲁木齐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当时，陈楚三才出生二个月。

秦始皇暴政，老百姓揭竿起义。楚霸王项羽生逢乱世，以八千子弟兵起家，灭了秦国。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南公曾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楚三的名字起得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意义。

落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陈楚三问清我的来意后，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十分慷慨地说：“好吧，我让你进去。”仿佛我是被准许去参观一个“闲人免进”的军事基地。

在进门前，大概是怕我有前来侦察科学馆工事的意图，陈楚三让他的手下用一块黑布将我的眼睛蒙上。

从这一刻起，我在黑暗之中生活了将近七十天。当我重见阳光时，眼前的树木人物都苍白

得像曝光过度的照片。

在黑暗中，我凭感觉知道我被带到了一个大房间里。赐坐，倒也待之如宾。陈楚三要我将装有衣物的书包交给他，我紧紧捂住书包说：“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仿佛这个书包是我见到陈育延的通行证，万万丢不得。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只听到陈楚三身旁的人一声断喝：“他妈的，进来了还不老实！给他一个下马威。”说时迟那时快，我被人从椅子上拉起，胸口感受到猛烈的打击。

刹那间，我只觉得所有的气管支气管，甚至于毛细气管都被棉花堵塞了，一点气也喘不过来。

当我的一部分大脑在和现实发生互动时，总有另外一个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在活动。前者（现实的我）只是后者的一个观察对象，就像是一本正在阅读的书或者是一部正在观赏的电影。和现实互动的思维当然会产生很大的痛苦或快乐，而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则理智得多，而且富于想象力。

“哇，”我的第二思维立即幸灾乐祸地评论：“原来胸部挨打是这种滋味。”（在当天晚上的另一次拷问中，我又体会到了头部被打的感觉。审问我的人用棍子猛敲我的头顶。每敲一次，我被黑布蒙住的眼睛前便会一片金光灿烂，有如无数颗金星在闪烁，壮观而又美丽。）

容不得我去细细品味这第一次打击的味道，我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便遭到六，七个人地毯式的轮番轰炸。浑身的痛楚让我害怕起来：莫非我真的会像孙华栋一样被活活打死？

我猜想殴打孙华栋的人的本意并非要置他于死地，而是出手太重或打在了要害处，导致孙的死亡。我也相信这些殴打我的学生并不愿意我死在他们的手上。为了便于他们掌握分寸，适可而止，我有意将我的呻吟声由高而低，以至于无声。

这一招果然奏效，我听见在旁边观战的几个女学生在劝说：“不要打了，他不行了。”

伟大的女性！

她们可以引发战争，如外国的海伦和中国的陈圆圆；她们也可以解救苦难，如天上的观世音和人间的清华女学生们。

我被活着抬走了。

在另一个房间，我躺在地上“会见”了科学馆里第一个难友杨立人。他似乎也刚被殴打过，正在呻吟中。

这杨立人在清华文革中也小有名气。说起来，他还是杨开慧的亲戚，父亲和青年毛泽东有过交往。他在大字报上署名“金戈铁马”，观点也比较极端，曾经炮打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的调查员文章。我原以为他是一个豪爽型的汉子。岂料我眼前的杨立人不仅举手投足，而且讲话的声调都非常“娘娘腔”。想起他自称“金戈铁马”，不禁好笑起来。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京口（今镇江）北固亭怀古》一词慷慨悲壮，豪情无比。如今，这如虎的“金戈铁马”忽然娘娘腔起来，岂不滑稽。

娘娘腔的杨立人倒是颇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一边大声哼哼，一边小声和我交换“情报”。原来，他也不是战场上的俘虏，但因炮打《红旗》杂志一事，4 1 4视他为反动学生。他从外地回学校时，没料到“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中埋有伏兵，被逮个正着。

沈如槐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中提到：孙华栋被团派的人打死后，“4 1 4的人对‘狗熊’无端绑架杀害非武斗人员的行为异常愤慨，决定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扣押在科学馆。”

于是，一批和平居民被伺机“请”进了科学馆，先后成为我的难友。这些人虽然是被“随机抽样”绑架来的，但倘若将各人的命运和在文革时的遭遇叠加起来，却也构成清华文革的一个缩影。除了杨立人，列举这些难友的经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曾昭奋，土建系教师，文革期间参加了以清华教师为主的“红教联”组织。因为“红教联”遭到4 1 4派的猛烈批判，曾也就被“请”进科学馆“说清楚”。我不知道曾昭奋是否在棍棒之下，将他和“红教联”的问题“说清楚”了。但我猜想很难。直到今天，关于“红教联”的是是非非，当事人和研究者或出书著文，或在互联网上争论得不亦乐乎。

1997年，“红教联”的主要负责人陶德坚在加拿大去世。她在病榻上写下《风雨人生》，给世人留下了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当年，4 1 4派对“红教联”不遗余力的批判可谓影响深远，不仅像唐少杰那样没有参加过文化革命的“文革研究权威”会在他的专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中沿用4 1 4派对“红教联”的批判，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

曾昭奋出身于广东潮汕农村的一个世代华侨家庭。因为“红教联”一案，他被定为“敌我矛盾”。“四人帮”倒台后，他虽然被恩赐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先是“犯政治错误”，后又修改为“属一般错误”。

这种对个人的政治结论“留有尾巴”的处理方式不过是为了让那些诬陷他的“材料”可以继续存活在他的个人档案里吞噬他的余生。

然而，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曾昭奋和陶德坚都成了受人尊敬的学者。

在我看来，文革中各派的政治观点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只有个人的命运才值得人们去关注和深思。

1998年，已成为建筑界著名教授和《世界建筑》主编的曾昭奋，在《读书》上首次披露了我们在科学馆中的遭遇。十年中，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不少人向我问及文章背后的故事。

左羽，清华职工，和清华行政处的一个姓蔡的工人，在去领工资的路上中了埋伏，一起被关进了进来。好在科学馆里住宿和吃饭都不收钱，工资没领到也不碍事。

1949年前，左羽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1957年，因给清华党委提意见被打成右

派，虽然他倒是姓“左”。文革伊始，清华园出现反党委的大字报，有人贴了一张保党委的大字报《右派笑了》，警告反党委的群众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的覆辙。这“笑了”的右派指的就是左羽。

被打成右派后，为了不连累妻子和女儿，左羽离了婚。他别无所求，唯一难以割舍的是和女儿之间的情感，常常想去看望她。可是才十岁的女儿在学校里受的教育是“右派就是反动派”，不肯见他，还将他买给她的玩具扔了出来，说她不要反动派的东西。在科学馆的黑暗中，当他讲述这段人生经历时，不禁潸然泪下。

虽然我对1957年反右中发生的事和人物有浓厚的兴趣，但那时我对“右派分子”的认识大体上和左羽的十岁女儿处于同一水平。左羽使我开始了解到“右派分子”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并拥有理想的人。他们苦难而沉重的人生遭遇令人同情和发人深思。

贾振陆，数力系学生，和我同系，但高一级。他白天和女朋友吵架，深夜回清华，忧心忡忡，慌不择路，被414派的人“伺机绑架”。在科学馆的黑牢里，他无比追悔他和女友的那场争吵，也十分焦虑他和女友争吵后的“突然失踪”会有什么后果。

多年后，他出任华夏银行技术总监，在上海开会时特意来看我。旧事重提，当年的痛苦都成了开怀的笑料。

陈家宝，无线电系学生。比其它俘虏幸运的是他的女朋友加入了414派。陈被抓后，女友来“探监”。陈家宝受到特殊优待。或许，他便是沈如槐心目中一个没有受到虐待的俘虏。

6月中的一天，科学馆屋顶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广播了陈家宝退出团派加入414派的声明。陈听到广播后通过我秘密挖好的小洞传给我一张小纸条，说那个声明是伪造的，他没有当叛徒。为了讨回他的清白，他准备越狱。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陈家宝为了证明自己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忠诚”而冒险越狱的行为。但在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年学生就是这样盲目地为所谓的真理而献身。陈家宝如此，那些拿着长矛参加武斗的大多数学生恐怕也是如此。

在这之前，我曾经逃跑过一次。逃出科学馆后因路线不对，被在外面放哨的卫兵截住，扑倒在地。在科学馆外面的草坪上，十几根长矛直逼我的眼睛，成为我在科学馆里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

我虽然逃跑失败，全身又被用钢丝捆住达二十多个小时，但我因此知道选择另一条路线从科学馆逃走是可能的。6月中旬已属夏令，守卫科学馆的学生每天都要午睡，门口只留一人把守。科学馆的厕所就在大门口，只要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乘其不备冲出去，就可能成功。

我将我的逃跑“经验”告诉了陈家宝。在以后的几天中，陈每天在他的“牢房”中原地跑步，为越狱做准备。

一天中午，我们几个俘虏一起被带到门口上厕所。当我们都已出来后，迟迟不见陈家宝的动静。我明白他想跑。我对领我们上厕所的看守说：“你先将我们送回牢房吧，否则我们一起逃跑，你抓哪一个？”看守不疑有诈，便在告诉门口放哨的学生厕所里还有一个俘虏后，带我们走了。

结果，陈家宝果然乘虚逃跑了。陈逃跑的当天，便通过团派的高音喇叭广播了他的声明，指责前几天4 1 4派广播的他的“叛变”声明是伪造的。这一事件理所当然地让4 1 4派的人十分恼火。他们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我知道并配合了陈的逃跑。我也就被理所当然地痛打了一顿。

在陈家宝逃跑前，每个俘虏都能享受“住单间”的待遇。所谓“单间”，实际上是学生做光学实验时用的一个狭长暗室，不到三平方米。暗室之间用木板相隔。

参加武斗的学生算是投笔从戎，虽然拿起了刀枪，但也不可一日无书。4 1 4派的武斗人员在从各食堂“抢夺”粮食，为日后坚守作准备时，居然没有忘记从图书馆抢了一批书。一日，我趁看守不备，从中“偷”了一本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这本书如同一道阳光照亮了这黑暗的斗室，使我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惧。在昏暗的蜡烛光下，当我追随邹韬奋周游列国时，我全然不知身处何方。

书有数百页之厚，书中绝大部份内容都已不记得了。然而，邹韬奋在克里米亚海边天体浴场，被一群一丝不挂的苏联女孩子将他遮羞的小裤叉拉下，那情景，以及他由感到难堪到变得自然，甚至自觉那条小裤叉是多余的心理活动，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巴黎，他又去了一家有几个裸体 Waitress 的酒吧“探秘”。当这些裸体女郎围着他周旋时，在餐厅四周数百面不同角度的镜子折射下，邹韬奋自觉成了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唐明皇。

我也奇怪为什么只有这些和 Sex 相关的情节会如此鲜明地留在记忆中。1982年，我在美国读了李敖的《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等文章，看到他放肆地描写他在黑牢里的性心理活动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是人在黑牢环境的极度压抑下产生的一种特殊反应。

陈家宝逃跑后，为了便于看管，我们五个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里。四个人躺下后，第五个人只能坐着。

上厕所也受到了限制。在这个狭小的牢房里放了一个硫酸罐，作为我们“处理人体废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虏抬出去倒掉。

密不通风的光学实验室变成了“化学实验室”，充满了阿摩尼亚的气味。

“人有三急”，这一点人道主义是不能不讲的。但为了防止逃跑，我们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在三分分钟内“完成任务”。这条规定让我“便秘”了近一个月，到后来，即使给我三个小时，我也无法完成任务了。

好在我们还有限制饮食的规定，每天两个馒头被如狼似虎的肠胃消灭得一干二净。一个月便秘居然没有造成肠道拥堵，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不知是否能列入吉尼斯记录。

陶森，电机系总支书记。她高中毕业后做过几年北京东单区委的小干事。1956年，为了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恶补已经荒废的功课。三个月后居然考上了清华。但清华党委没有让她向科学进军，而是将她培养成一名党的干部。

4 1 4派虽然为解放干部做过许多值得称许的事，但也不敢偏离批判“走资派”的文革大方向。陶森便是他们作为“走资派”重点斗争的对象之一。那时候，两派学生互相揪斗加入对方组织的干部，使清华许多干部无所适从。

4月23日，4 1 4派原定当天上午在大礼堂召开批斗陶森的大会。不料团派在凌晨抢占

了大礼堂，批斗陶森成了百日大武斗的导火索。陶森也就成了第一个关押在科学馆的俘虏。

陈育延被释放后，她是科学馆中唯一的女性难友，被单独关押。在我们被集中关押后，她成了我们的邻居，和我们仅隔了一块木板，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彼此的讲话。她从未参加过我们的交谈。整个关押期间，我只记得她说过两次话，都是和我有关。

一次是在我讲述进科学馆的原因和经过时，突然听到她在隔壁发表了一句评论：“叶志江，你真是一个中世纪骑士！”

第二次是在我近一个月大便不通，痛苦不堪时，她教我用一块肥皂削成子弹形状，蘸上水塞进肛门。我照她的办法试了，果然成功地将堵在肛门口干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排泄出来。

听说文革后她又回到领导岗位，担任过清华大学总会计师，清华大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离开科学馆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但我从未忘记她对我的赞许和帮助。

在我进科学馆后的最初几天中，还有一个“难友”，那就是陈育延。她是4 1 4派抓获的最重要的俘虏，但我在科学馆中始终未能见到她。

和我在科学馆中“游戏人生”不同，陈育延一进科学馆便立即显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毫无疑问，陈育延掌握着4 1 4派想知道的许多重要情况。他们也知道陈育延在团派总部受到排挤，因而十分想撬开陈育延的嘴。沈如槐在他的书中简洁而真实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4 1 4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实，并绝食抗议。”

陈育延绝食了七天。第八天，望着奄奄一息的陈育延，4 1 4派的头头动了恻隐之心，决定释放她。毕竟，4 1 4总部有许多人加入过陈育延发起成立的“八八串联会”，是所谓的“老八八派”，彼此有过共同战斗的友情。在陈育延签署了“离开科学馆后，生死自负”的字据后，她被抬出了科学馆。

文革时，陈育延思想激进，被人称为“陈常左”，那是时代给她的烙印。举一小例，毕业前夕我打算拿到第一份工资后给陈育延买一件绿毛衣，因为我觉得她穿绿毛衣很漂亮。

不料陈脸色一沉：“你怎么和余永泽一样庸俗！”

我鄂然。余永泽是小说《青春之歌》中一个迂腐落后的北大学生。我不知道买绿毛衣和他有何相干。

“余永泽也说过他北大毕业后第一个心愿就是给林道静买一件绿大衣，你们连喜欢的颜色都一样！我说你和余永泽一样庸俗，是因为你和他一样不关心革命，就想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陈育延言之凿凿，不容辩驳。

我恍然大悟，深感无地自容。

但她正直，善良，高贵和理想主义的品质也令人印象深刻。她不仅在科学馆里主动绝食，以死抗争，不肯出卖同志，在蒯大富、沈如槐等清华大学文革风云人物日后受到审查时，她也从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



毕业后，她被发配到贵州省正定县安常镇一个中学教书。

人的归宿有时和地名会有一种宿命般的联系。三国时，“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和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便战死在“落凤坡”。

外号“陈常左”的陈育延落难“安常镇”，也算是命中注定。

1972年，她回北京探亲，工宣队知道后将她叫到清华。

“蒯大富已被隔离审查，希望你能揭发他的问题。”工宣队告诉陈育延。

“我在毕业前已写过有关材料，我没有新的补充。”陈回答说。

“你写的材料我们看了，你应当知道更多事情。蒯大富问题的性质已经变化了，你要站稳立场。好好回忆一下。”工宣队软中带硬。

“我现在的记忆肯定没有几年前请晰完整，我当时写的都是真实情况，我不会推翻。你们要作新的解释，那是你们的事。”陈育延本色不改，软硬不吃。

双方唇枪舌剑，争论到吃中饭的时候。午饭后，工宣队退而求其次：“我们取来了你过去写的材料，你在上面签个名确认一下。”

“那可以。”陈也是爽快人。

她翻了一下工宣队交给她的几页纸，突然发问：“那不是我的笔迹。”

“这是我们从你写的材料上摘录下来的，都是你的原话。”工宣队显然还不了解陈育延是何等人物。

果然，陈立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们的摘录有没有错误，没有原件核对，我不能签名！”

不知道是工宣队找不到原件，还是这些摘录里有“猫腻”。他们终于恼羞成怒了：“你不肯合作，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以后会有办法对付你。你中午在食堂吃了饭，请你付两角饭钱。”

陈连这点小事也不肯示弱：“吃饭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从家中乘公共汽车到清华，来回车钱三角，应当由你们付。扣去两角饭钱，请你们给我一角钱。”

工宣队只得摆摆手，让陈育延一走了之。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过后不久，安常镇中学便收到了清华大学调查陈育延的公函。

陈育延离开科学馆后才知道我因去救她而被扣押了。她大为感动。她并无太多音乐细胞，但在我被关押的两个多月中，却常常弹奏古曲《苏武牧羊》：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这段词实在太美了，也和我们当时的情况和心境太贴切了。不仅是陈育延“红妆守空帏”，我的老母也焦虑万分。她冒着风险，多次到科学馆向414派的武斗人员求情。有一次，她感动了他们，被准许进来探望我。我因为挨打，一条裤腿被撕破，露出血迹和伤痕。我怕母亲看到后伤心，见面时我始终坐着，用另一条腿压住撕破的裤腿。

在我出狱后的头一个晚上，陈育延十分动情地为我弹奏了这支古曲。我听后亦大感动，泪如泉涌。

但这段让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有将我们永久地维系在一起。1975年，我们在武汉又戏剧般地分手。

小说《青春之歌》里，余永泽在北戴河海边救起了投海的林道静。两人相恋后又分手。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先生晚年写了一本《流年碎影》，言及他和小说作者杨沫（林道静的原型）的那段合和分“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

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和陈的分手也应当是不错的。

和陈育延以死抗争不同，我虽然也算得上“坚贞不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在“斗智”。

七月初的一天，团派武斗人员向科学馆的屋顶发射了燃烧弹，引燃了屋顶上的油毛毡，一时大火熊熊，整个屋顶被烧毁。而团派的高音喇叭却颠倒黑白，指控4 1 4派制造“国会纵火案”，企图烧死被关押的团派俘虏。科学馆里的4 1 4人员群情激愤，将我们驱赶到烧毁的屋顶，向我们展示团派的暴行。当然，在愤怒中也免不了对我们施以拳脚。

当我们被带回牢房后，看守拿来纸和笔，对我说：“团派广播说是我们放火烧死俘虏，你文章写得好，你将真实情况写出来，我们马上要广播。”

团派这种行为，显然是不管我们这些俘虏的死活，给我们制造难题。我不写，免不了一顿毒打；写真实情况，让团派难堪事小，我自己“失节”事大。略作思索，我写了如下一段话交给了看守：“火起时，我们全体俘虏都在一楼，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火扑灭后，我们又被带回一楼。我们现在都安全。叶志江”

4 1 4派的人看了我的字条后，对我的“机智”倒是很欣赏。因为我写了一段既符合事实，却又无法广播的文字。虽然我确认了俘虏们的安全，但“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这段话却可能被团派拿来作文章。

看守对我说：“算你脑袋瓜灵，不广播了。”

我免去了一顿毒打。

除了毒打，在科学馆中最难忍受的还有饥饿。

我们每天发给两个馒头，大约下午二点发一个，晚上六点发一个。没有任何蔬菜肉食之类，只有一碗盐放在牢房中供食用。从晚上六点至第二天下午二点，整整二十个小时饥肠辘辘。

在清华念书的学生中喜欢吃米饭的南方人居多。而当时北京人的粮食配给是百分之四十玉米面，百分之四十面粉，百分之二十大米。对南方学生而言，吃米饭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武斗开始后，两派武斗人员都从各食堂中抢夺大米和面粉。科学馆里的武斗人员最初每天都可以吃到米饭。但在科学馆被围困的后期，由于蔬菜鱼肉的供应中断，4 1 4派的武斗人员每天也只能吃面片汤和花卷。上好的大米只能用来代替沙袋，修筑工事了。

俘虏们吃的是馒头，但大师傅不可能为俘虏每顿去做馒头，而是一次做一个星期的。那个时候，冰箱之类的东西只有在书中见到过。六、七月份，已是盛夏，天气炎热。我们吃的馒头也就由热变冷、变硬、变馊，最后变成了“藕”，掰开后，真的是“藕”断丝连了。

但就是这种“藕”一样的馒头，也成了我们最美味的食品，需要用二十个小时去盼望它。

在饥饿难忍的时候，我们采用“精神会餐”来安慰我们的肠胃。每个人都将自己吃过的最好的食品描述一番。左羽是我们中间最“有钱”的，也就成了“精神会餐”的主讲。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重讲香酥鸭的滋味，直到出狱后的第二天我们一起到王府井去真正品尝了香酥鸭为止。

一天晚上，看守突然端来两碗面片汤，让我和姓蔡的工人喝掉。一股久违的香味扑鼻而来，碗里还似乎漂着几片诱人的肥肉。当时我们五个俘虏合住在一间十分狭小的牢房中，我可以感到每个人都被这两碗面汤刺激得直咽口水。我迟疑了一下，问看守：

“那其他三个人呢？”

“只有两碗，快喝。”看守说。

“那我们分着喝。”我马上说，不料看守厉声回答：

“蔡是工人，你出身是工人，可以喝。他们三个成份不好，没有资格喝。”

那真是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即使当了俘虏，也得按阶级成份加以区别！

尽管那两碗面汤如此诱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更珍贵。我对看守说：“你拿回去吧，我们都不喝！”

我和陈育延，以及我在科学馆中的全体难友，大多是4 1 4派在孙华栋被打死后“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而抓进来的，其中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武斗。我们这批人除了帮助消耗抢来的粮食（陈育延除外）以外，唯一的作用大概也就是供他们练练拳脚而已。我们不能或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情报”，没有宣传价值（唯一的一次宣传机会又因为陈家宝的逃跑而弄巧成拙），甚至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因为团派对我们的生死存亡丝毫不关心。然而，我们这批人的存在毕竟是“清华百日大武斗”的一个侧面，它或多或少地会折射出武斗期间人们的心态、行为和命运。

当我们在黑牢中苦苦挣扎时，科学馆墙外的武斗已从“原始战争”演变为“现代化战争”。两派都拥有了“热武器”，除了一般的枪支弹药外，还拥有土炮和土坦克之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些真枪真炮大都是通过各种手段，从外地的解放军部队或造反派手中搞来的。据说，有一个学生为了搞到武器，不惜使用“美男计”，和某地军分区司令的女儿谈起了“恋爱”。他利用出入军区的便利和司令女儿的配合，搞到了十几支步枪。

清华大学是理工科大学，拥有设备十分完善的校办工厂。武斗期间，这些校办工厂变成了两派的“兵工厂”。清华学生入学后要接受一个月的金工劳动和训练，车、钳、刨、铣、磨和焊，样样都会，动手能力很强。于是，大批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甚至土坦克和装甲车被两派学生制造出来，并被投入战场。

武器的升级必然导致伤亡人数的上升。

一天晚上，我听到墙外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喊叫声。从喊声中我听出是一个放哨的4 1 4派学生被老团开枪打死了。每当这种时候，我们这些俘虏便胆战心惊，生怕老四将仇恨转嫁到我们头上。那天晚上我便作为死者的“祭品”而饱尝拳脚。

在战场上，一颗穿甲弹让两个曾经相遇相识的学生有了不同的命运。

这两个学生中，一个是冶金系的学生周家琮，另一个是电机系的学生赵德胜。我和他们曾到重庆“大串联”，一起住在重庆江北大横街小学。

当清华学生分裂成两派时，周家琮加入了414派，而赵德胜加入了团派。两个人都参加了“百日大武斗”。周家琮能文能武，一手持长矛，一手用笔写杂文《有感一读〈“友邦惊诧”论〉》，指责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对团派的偏袒。沈如槐将它誉之为“这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看到的最有战斗力的一篇杂文”。（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401页）

7月6日，当周家琮乘坐“装甲车”驶向科学馆时，埋伏在第一教学楼旁的赵德胜向装甲车发射了一枚穿甲弹。土制的装甲车难以抵挡货真价实的穿甲弹，司机杨述立当场毙命，而周家琮侥幸逃过一命。

我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当我和姚永宁在逃离重庆时，他决定“甩”掉赵德胜。事后他对我说：“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或许赵德胜并不知道周家琮就在装甲车上，但我却因此事的发生而相信了姚永宁两年前的判断：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

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中红军女战士冯留特卡爱上了一个有蓝眼睛的白匪俘虏，年轻英俊的中尉奥特洛克。当“蓝眼睛”在押解途中试图逃跑时，冯留特卡扣动了扳机，“蓝眼睛”成了她枪下的“第四十一个”。鲜血映着蓝蓝的海水，浪花拍击着海岸，冯留特卡哭喊着：“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我不知道那些向昔日的同窗好友扣动扳机的学生是出于何种动机。是像赵德胜那样因为心中怀有仇恨？还是像冯留特卡那样出于对革命的信念？

我被关押在科学馆时，周家琮曾试图来探望我，但被看守劝阻。毕业离校后，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及各人的遭遇，并提到了他遇险这件事。他说：“既然赵德胜念及我们在重庆时的友情而让我侥幸活下来，我也只得辛辛苦苦地活下去……。”当时，他已为了追寻他的“梦中情人”而到了四川攀枝花。

攀枝花钢铁公司位于川滇交界处的大山沟中，四十年前正是攀钢草创初期，那里的生活自然是相当艰苦的。毛泽东说：“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着觉。”死里逃生的周家琮不怕吃苦，不怕没有好觉睡，在那里奋斗了数十年。几年前，当我在上海再次见到周家琮时，他已是攀钢集团这个特大企业的付总裁了。

而赵德胜则因武斗时杀人一事进了大牢。

1968年7月12日，在全国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两年后，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7月12日的前后几天中，被围得水泄不通的科学馆上空有“永不消失的电波”，那是被围的414派学生通过高音喇叭播出的联络密码，而科学馆的地下，解救被围人员的地道正在日夜不停地秘密挖掘中。令老四们扼腕的是，团派的学生居然用埋在壕沟里的水缸准确地测出地道的方位，并用炸药将它摧毁。

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如此“能文能武”，显然让人印象深刻，所以，“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毫无疑问，作为全国最大的理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一定在毛泽东的视线内。

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不在这些能文能武的理工科大学学生头上套上金箍咒，他们也会无法无天，走火入魔。所以，在讲了“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半个月后，他便作出了制止清华学生武斗的重大决定。

我们的苦难日子也终于熬到了头。

1968年7月27日，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几万名工人进入清华园制止武斗。蒯大富愚蠢地下令抵抗，打死了数名工人。而414派则明智地放下武器，拆除工事。当晚，毛泽东召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宣告红卫兵运动结束，工人阶级登上舞台。

我们当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但拆除工事所发出的巨大声响使我们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很快，我们便听到牢房外有很多杂乱的脚步声。有一个人在问：

“这房间里有人吗？”

“没有人。”看守回答。

听到正在离去的脚步声，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出声音。因为万一一切照旧，谁发了声音谁就可能挨打。但机会难得，我不能让那些杂乱的脚步离去而无所作为。急中生智，我用脚将一个搪瓷杯踢到了房间中的硫酸罐上，只听到咣啷一声后，离去的脚步停住了：

“房间里有人，将门打开！”

门开了。一个工人向我们宣布：

“我们是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来清华制止武斗。”

就像那个时代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镜头一样，我和其他俘虏一齐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阶级万岁！”

我们见到了阳光，人群和树木，我们也不再挨饿了。当天晚上，贾振陆一口气吃了两斤米饭，我也吃了一斤二两米饭。我们根本不需要下饭的菜，饭团一进入口中便会自动吞下去，仿佛喉咙处有一股强大的吸力。

但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两派迟迟不能达成交换俘虏的协议，我们被转移到主楼三楼的大教室，依旧是原来的看守看管我们。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是多么渴望自由。我决定组织越狱。一天中午，当我确定大多数人已经午睡后，我拉开了已在几天前被我悄悄弄坏门扣的房门。几个俘虏跟着我从主楼楼梯旁离地近十米高的窗口跳下，除了曾昭奋脚后跟粉碎性骨折，我们顺利地逃脱。曾忍着剧痛，用脚尖猛跑，最后瘫倒在地，一辆路过的粪车将受伤的曾昭奋送了回来。

在414派向工宣队报告俘虏逃跑一事，两派举行紧急会议。团派坚称没有见到任何俘虏，指控414派阴谋杀害俘虏。但陈育延在会上忍俊不禁的笑容露出了破绽。

414派已无俘虏可交换，两派迅速达成了协议。

在逃跑前，我曾想带走那本陪我度过了这段苦难日子的《萍踪寄语》。离开科学馆时，我已将它悄悄带在身边。但转念一想，这本书原是清华图书馆的，万一逃跑时被抓住，我岂不多了一条“偷书”的罪名。我只得恋恋不舍地将它放下。

几十年中，每当我去书店时，我都会在书架上寻觅这本书的踪迹。然而，在形形色色的出版物充斥于书市的今天，它却踪影全无，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了。

而我好想重读这本书。

注一：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几天后，陈育延和叶志江推着自行车从科学馆前路过，他们是团派中反对武斗的“鸽派”，自以为414不会为难他们。哪知道414发现他们后，立即派人拦截。叶志江骑车跑了，陈育延被抓到科学馆。414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口，并绝食抗议。一周后，叶志江来到科学馆，对414守卫人员说，陈育延有病，他愿意作为人质留在科学馆，换取陈育延的自由。结果陈育延走了，叶志江被我们扣押在科学馆，直到7·27工宣队进校。叶志江是28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他的许多观点都曾遭到我们的口诛笔伐。但是，他讲义气、重情感，危难时刻舍己救人的行为，却不失英雄气概、男人本色，着实令人敬佩。

2007年底，我在收到曾留守科学馆的414派学生邱心伟寄来沈如槐的书后便复信给她，指出书中几个不确之处：

心伟：

发来的邮件和寄来的书都看了。时隔四十年，但很多事如今读来却恍若昨天。不同的是当年的是非恩怨早已被岁月磨去。想要搞点研究探讨之类，也非风烛残年所能胜任的。一旦钻了牛角尖（或曰“顿悟”注），说不定就会追随周泉樱去信佛了。你所说的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真相，倒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要真做起来也难。

沈如槐据说花了六年时间写了一部清华文革记事。其记载之翔实，在我看来几乎是同类书中最有史料价值的了。但倘要追究起来，恐怕也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以我个人为例，书中366页提到了我当年“英雄救美”的往事。这件事本与革命的主题毫不相干，不过是给血腥的武斗添加了一点小资情调而已。但既蒙厚爱写入“文革记事”，我当主角的对这段文字不妨考证一番，留一点“真相”给读者。

书中说陈育延被抓后一周，我去科学馆要求留下当人质换取陈育延的自由。其实我三天后就去了科学馆。因为陈被抓，我骑车跑掉是不得已的。当时我的自行车上有一书包陈育延的日记。日记里有团派历次（包括武斗期间）总部会议的记录，孙华栋事件和炮打康生的材料，当然还有不少充满小资情调的个人隐私。所以陈育延要我快跑。我对陈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就骑车跑了。倘若当年老四得到了这些日记，“百日武斗”恐怕会有更多的精彩情节了。

三天后，我在皮带后面藏了一把小刀去科学馆“救美”，脑中绝无“交换人质”的幻想。我想陈育延被放也不是我去科学馆的结果，而是因为她绝食七天，老四念其是“老八八”，不忍心让她饿死在科学馆。

我之被扣，当然是自投罗网。但书中称我是“28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则令我大惑不解。我当年从未加入“28团”，至今都不知道28团有哪些英雄好汉，如何能充当其笔杆子？文革中我写过一些令人注目的大字报，但都是以个人署名的。我自忖也并未为老团提出过什么可以“必胜”或必败的理论，是当不了什么“家”的。

当然，我很感谢沈如槐在他的书中重提当年这个插曲和称我“舍己救人”的溢美之词。我想说明的是，要想白纸黑字留下历史真相并非易事。

注：周泉樱在他最近出版的《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一书的作者自序中说“1997年，我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突然顿悟”。文革期间，周泉樱在清华园贴出《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成为清华大学“414”派的理论家。

叶志江

注二：曾昭奋《科学春秋》：就在科学馆大火之前，我和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叶志江同学等就被关在科学馆一间暗室中的几个小暗室里。

.....

叶志江同学却非常乐观，时不时朗诵“大江东去”。他还说，“我们没有受过白公馆、渣滓洞的罪，现在正好来补补课。”事实上，我们这些被逮进来的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刚被逮来时，先是一个“下马威”：眼睛被蒙住，站着，周围大概站着四、五个身壮力气大的学生，轮番拳腿交加。我的经验是，只痛皮肉，不伤根本。年纪大者在被毆、摔倒、爬起、再被毆、再摔倒的过程中，折了骨头，伤了内脏，可视为“意外”。

且说这叶志江（正好与叶企孙先生同姓），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他于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学。一九六四年，他在《数学通报》上半年内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对“正项级数判敛的一个方法”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定理）并加以证明，而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同样的定理时则未加证明。杂志编辑对此表示了特别的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北京市领导人和学校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黑帮，他叶志江也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年纪轻轻的，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

注三：黄肖路，旅美华人，目前正在美国著述关于父亲黄万里和清华园的回忆。杜欣欣，旅美华人，著有《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在时间中沉醉——关于自然、历史和文化名人的散记》等书。

~~~~~

#### 【文献资料】

在武汉市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1967.10.19)

• 周恩来 •

亲爱的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拉米兹·阿利雅同志，  
亲爱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同志们，  
武汉市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红卫兵的战友们，同志们：

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满载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深厚的革命情谊，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这几天，代表团分路访问了济南、青岛和大寨、太原、延安，现在汇合到了武汉，我们向他们再一次表示衷心、最热烈的欢迎。

同志们，战友们！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最大的喜讯。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这次是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专门邀请来到武汉的。毛主席请他们亲自来看看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他们也很想来看看这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对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

武汉，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在这里乘风破浪，畅游长江。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又经受了新的考验。今天，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里举行盛大

集会，欢迎来自反帝反修斗争前线的阿尔巴尼亚战友，我们感到分外亲切，无比兴奋。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红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出现了新的修正主义。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了铁托叛徒集团。接着，在具有伟大的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苏联，又产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也堕落成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欧洲首先举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不畏强暴，不怕困难，不怕孤立，坚贞不屈，同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铁托叛徒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毫不调和的斗争。

当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颜色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滋长，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四面包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近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宣传无神论；解放妇女；提倡精神鼓励；缩减高工资和低工资的差距；减少自留地和自留牲畜；农业全面合作化；发展山区，争取粮食自给；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实行干部轮换制度；全国民兵化；枪和镐走上文艺舞台，等等。阿尔巴尼亚同志们在革命化运动中说到做到，雷厉风行，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欧洲最年轻的共产党之一。但是，它坚持真理，朝气蓬勃，不断前进，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去年年底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把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事业建立了新的功勋，使阿尔巴尼亚这面欧洲的革命红旗更加光彩夺目。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只要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后来居上。

毛泽东主席在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高度赞扬说：“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捧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中国人民以有阿尔巴尼亚这样伟大的战友，而深深地感到自豪。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在国内外阶级斗争中，依靠广大群众，不断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它诞生的时刻时，就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展开武装斗争，反对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当欧洲一些大大小小的“议会迷”，为了在战后资产阶级政府中求得一官半职而准备向敌人交枪投降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毫不动摇地紧握枪杆子，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祖国，并且支援了希腊和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的斗争。解放以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不断加强国防，警惕地保卫着社会主义祖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经验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所指出的伟大真理：“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千方百计地企图颠覆和侵占阿尔巴尼亚。最近，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上台，更是虎视眈眈，妄图侵犯阿尔巴尼亚。霍查同志在九月召开的民主阵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和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提出了严厉的警告，指出如果他们胆敢冒险闯进阿尔巴尼亚，他们将遭到严厉的惩罚。我们完全支持霍查同志代表



阿尔巴尼亚人民所表示的这一严正立场。我们相信，富有武装斗争传统的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充满着旺盛的战斗精神，是不可战胜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决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站在阿尔巴尼亚一边，阿尔巴尼亚的朋友遍天下。中阿两国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是永远并肩战斗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必须把中阿两国计算在一起。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执行革命的对外政策。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阿尔巴尼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普遍赞扬，使阿尔巴尼亚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结束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任务。越南人民站在反美武装斗争的最前线，牵制了美帝国主义很大的一部分力量，沉重地打击了它的侵略气焰。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与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出卖各国人民利益的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但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美力量。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坚持斗争，那末，不管现代修正主义怎样为它效劳，全世界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日子就一定会早日到来。

同志们、战友们！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亿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普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了。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重新回到了无产阶级的手里。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武汉地区也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两个多月以前，曾经乌云翻腾，阶级敌人猖狂一时。现在，敌人已经土崩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乱子有二重性”、“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的论断的英明正确。

现在看得很清楚：凡是出乱子的地方，有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动的，有的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敌特分子暗中捣鬼的。同时，社会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和影响，也为阶级敌人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提供了土壤。我们并不赞成出乱子，但是，阶级敌人硬要制造乱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这样做，正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经过这么一乱，阶级敌人彻底暴露了他们自己的真面目。这就从反面更加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愤怒和觉悟，擦亮了受蒙蔽群众的眼睛，把广大群众进一步动员起来了。

乱得厉害的地方，实际是更加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问题反而可以解决得更彻底。武汉地区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被击败了。暗藏在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这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更加坚强和壮大了。建立新的革命秩序，变成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自觉要求和行动。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

利。

当然，坏事变成好事，要有一定的条件。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崇高威望。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广大群众，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干部大多数。而解放军是具有长期革命战斗传统，并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劳动人民子弟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可靠支柱。正是由于我们有了这些最根本的条件，即使阶级敌人想乱得厉害一些，时间长一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摆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方面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特别是各单位的斗批改，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而要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很重要的关键。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武汉地区经过前一段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大是大非分清了，坏人孤立了，保守组织瓦解了。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组织就具备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条件。这次，你们联合起来欢度国庆，又联合起来欢迎和接待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是走向革命大联合的一个良好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好、更快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为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最高指示，开门整风，多作自我批评，多看别人的优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如有人破坏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大联合，要靠那个组织的革命群众自己揭发处理，别的组织不要去揪斗。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驻军和领导机关，应该多做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和促进各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就更能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到，今年农业又将是一个丰收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又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包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和一次氢弹试验。在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中，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在生产上付出一定代价，这是早在预计之内的。特别是在有乱子的地方，生产当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只是暂时现象。一旦乱化为治，生产很快就能恢复上升。人的思想的革命化，势必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相信，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飞跃发展的高潮。

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多快好省完成国家计划创造新成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的雄心壮志和光荣任务。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生产中经受考验。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职工和公社社员一定会这样做的，而且也一定能够做到的。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各级干部来说，是一场全面的审查和严峻的考验。经过一年多来的运动，揪出了一小撮坏人，发现了一大批好干部，也暴露了我们干部队伍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些干部官作大了，自以为了不起，好摆架子，喜欢训人，因而严重地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中国赫鲁晓夫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现在，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对干部的教育，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改善干部同群众的关系。

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即使犯有错误，甚至犯有严重错误，多数也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我们都要容许他们将功补过，带罪立功，都应该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使他们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相信，经过群众的批评和帮助，是应该而且也可以解放一大批干部的。

各级干部要自觉地接受群众的审查和批评。对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我们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抵触的乃至对立的态度。我们应该上请教于毛主席，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所谆谆教导我们的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应该下请教于群众，到群众中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谅解和信任，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向我们发出了“斗私，批修”的伟大战斗号令。这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私”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修正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根源。只有从头脑中彻底铲除“私”字，才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才能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战友们，同志们！

中阿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阿尔巴尼亚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亲自缔造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是经过急风暴雨的严峻考验的。这种友谊是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珍贵的友谊。

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共同斗争中，一贯相互支持，并肩前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在联合国内外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正确立场，挺身而出，勇敢地痛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的阴谋。

现在，阿尔巴尼亚的战友们又坚决地支持和热情地赞扬我国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恩维尔·霍查同志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全世界一切革命派

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是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度评价，这是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的极大鼓舞。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一贯给予我们最坚决、最热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支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再一次表示真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更加紧密地同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兄弟团结起来，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坚强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万岁！  
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万岁！  
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亲密战友恩维尔·霍查同志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最亲密战友毛主席万岁！  
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  
【书刊评论】

好一个“小兵”金敬迈

• 李南央 •

父亲李锐1966年7月9日的日记中记有：“至下午四点半，将《欧阳海之歌》（读毕）。此书值得多次翻阅，可学之处甚多，完全崭新的品质。”父亲那时已近知天命之年，且是戴罪之身，在看此书。我的同龄人中就更是无人不读“欧阳海”，无人不知它的作者——金敬迈了，除非他从来不知“书”为何物。金敬迈笔下的欧阳海与同时代的雷锋不同，他不是党要我们学的“样板英雄”，而是个有血肉，有性情的战士，让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们由衷地爱，由衷地效仿。

后来，金敬迈这个名字在“横扫一切”的年代曾被列入了报纸上那已经缩得很短、但能领导我们“继续革命”的耀眼名单中，只是时间不长，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现在若在大陆的街头做个调查，能够答出金敬迈何许人也的，怕是上不了两个百分点。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的老总送了我一套“九思实录书系”中已经发行的书，其中有一本《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作者居然是金敬迈。我把这本书放到了聂元梓、徐景贤这些当年名气更大些人的回忆录的后面，但这最末读的一本却让我记下了一万多字的摘记，写了这篇文章：请读读《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这本书厉害！

“不知从哪年开始，说清楚、说实话成了难题。……你要谈‘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件往事，别说别说，说不得；你要提到‘四人帮’的什么什么，别讲别讲，不能讲。不说不讲

行吗？这是对老百姓造下的孽、欠下的债，因为你不好意思，它就不存在了？这么糊弄下去，哪年是个头？”

一

几十年过去了，尤其1989年夏后几年，“文化大革命”在大陆成了个不能碰的禁区，其真实面貌已经模糊得十分可以了，要不在纪录片《Morning Sun》中将面孔隐在黑暗中的宋彬彬，怎么会不再忌讳让自己给毛泽东带袖章的照片和博士像一起堂堂正正地印在2007年师大女附中的《知名校友》册上？要不编辑怎么会把正是在毛泽东的一句“彬彬？要武嘛！”的激励下被打死的校长卞仲耘和宋放在册子的同一面上！纽约百老汇也有了音乐剧《江青》。弄得我女儿这一代中的一些孩子，以为江青与阿根廷前总统夫人艾薇塔·贝隆一样，虽然是影视演员出身，靠姿色手腕当了主席夫人，却是个给国家做过不少好事的悲剧人物。

而江青是与林彪搅和在一起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1980年的11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的。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写着：“林彪、江青一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罪行最重、为害最烈的反革命集团。他们为了篡党篡国，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包括国家主席（按：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按：朱德）、国务院总理（按：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按：邓小平）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没有死于敌人的监牢和炮火，却被林彪、江青一伙折磨致死。”

金敬迈在书中先引了江青在文革中接见红卫兵时讲的一段话：“革命小将们，我也是个很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只不过为党为革命多做了些工作罢了。这也是应该的。你们不要把我看成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首先，我是个共产党员，其次，我是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第三，我才是他的老婆……”

金敬迈然后说：

堂堂中华，如今只剩下八出戏了。八个样板全都没有了作者，都是首长一个人“磨”出来的“剑”。谁要是提个意见，谁就是反革命。……不就是对待一部文艺作品吗？样板戏成了人人必须信奉的“圣经”，它比圣经还神圣。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个更荒唐？

面对这个荒唐，谁都不敢吱声。八亿人民都懂得：她是碰不得、沾不得、惹不起的。黎民百姓懂，当官的也懂，而且官越大、地位越高，说话越算数的官，懂得的越具体：她的可怕不在于她“第一”是什么什么，也不在于她“第二”是什么什么，她的可怕、她的碰不得沾不得，她的惹不起，在于她“第三”才是个什么什么。

首长不是自称：我只是谁谁谁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游动哨兵吗？哨兵，你手里拿的是一支步枪，还是一颗原子弹？怎么威力就这么大，把全国的老百姓，不，岂止是老百姓，把全国全军全党的各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都给震住了？

据称中国有八亿舜尧，假定男女各半，都是四亿，那为什么单单她这个“四亿分之一”是如此神圣、如此不可侵犯，如此至高无上呢？她凭的是什么？她仰仗的是什么？

金敬迈谈的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是“浩劫”中人人尽知的事实。问：她仰仗的是什么？

二

感谢香港让金敬迈发出了声音，让我们知道这个曾短暂地“混进”领导队伍的人眼中所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东西。金敬迈字字滴血，他让我们必须面对、必须审视、必须承认那场运动过后沉淀在中华民族心底的是些什么样的污垢，扪心自问：不把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耻辱说清楚、洗刷干净，我们的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的后代还有未来吗？

金敬迈如此写道：

一场“史无前例”把人们心底最丑恶、最肮脏、最狠毒、最惨酷的一面搅翻了……小时候，我知道日本鬼子很坏，长大后，在这场“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创举中，我才明白，中国人当中的有些人并不比日本鬼子更好。

作为一个人，没有什么比尊严更值得珍贵的了。哺乳动物中……只有癞皮狗才不要尊严。我们则动不动就侮辱人，以侮辱人为乐，以侮辱人为革命。我们把自尊、清高、独立的人格，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反倒以不怕丑、不要脸为荣。斗争会上，谁最会污辱人，谁就最革命；谁能变着“花样”作贱人，谁就是积极分子；谁肯下狠心，谁就是我们重用、依靠的对象——几十年来，我们培养造就了这样一些“基本群众”。不管你犯的是什么罪，也不管你有错没错，只要“上边”说话了，就谁都可以往你脸上吐唾沫。吐唾沫的人革命最坚决、革命性最强，是好人；被吐的人，稍有不满意，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让唾沫挂在脸上，仍然满面笑容，这才表明你是可以“挽救”的。……我们到底要怎样折磨我们的人民，怎样来糟蹋我们这个民族呢？难怪敌人咒骂我们，骂我们是“痞子运动”！

“中国赫鲁晓夫的臭婆娘”在挨斗时，胸前挂着一长串乒乓球，……为什么要这样来作贱污辱一个人，特别是污辱一个女人呢？因为首长说了：她出国以前来请示过我，我嘱咐她说，衣着打扮要得体，你是代表社会主义中国出访的。但是，革命小将们，她不听我的，她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她居然像资产阶级的贵妇人似的戴了一串项链……这就犯下了滔天大罪了。大学生们、红卫兵们心领神会，于是，我们在污辱人的招数上又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乒乓球加入抹黑脸戴高帽的行列，成为我们这个黑铁时代的又一标志性的象征。历史会记住这一“创举”的。创举发生在那个全国著名的大学里。他们玷污了自己的光荣传统。我不知道他们痛不痛心。但是，历史不会把这件事忘记。受污辱的不是哪一个人，也不管他是好、是坏。受污辱的是我们的整个民族！

### 三

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传统，管你是当爹妈的、还是当领导的，从来都只喜欢听话的“乖孩子”，“乖下级”。“听话”、“乖”是晚辈和下级为人的首要条件，是一切被肯定的品德中最优秀的品质，是诸多美德中最关键最美的美德。“乖”，家长气顺，家庭和睦。“听话”，领导放心，天下太平，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听组织的话叫做“进步”，是向组织“靠拢”，是被赞扬、被肯定的；而保留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信念，被当成是“顽固”、“错误”，和组织上“分道扬镳”，不走一条路。这算什么标准？这正是被马克思批得头破血流的那个“柏林小市民”麦克斯一施蒂纳的观点！正确与错误、好坏是非的标准如此荒谬，只因为多年来，我们以什么“立场”的名义，“阶级”的名义在提倡背信弃义。我们从“阶级斗争”出发，鼓励落井下石。我们根本不谈人性，我们不承认有人性，我们完全无视人性中的正直，无视品德中的善，无视人间的美，用“斗争”用“立场”来掩盖一切假、恶、丑，借斗争弘扬假恶丑，以至假的、恶的、丑的人和事，四处泛滥，上下泛滥，无处不泛滥。人性泯灭了，道德沦丧了。这是我们做的孽！我们种下的这颗苦果是肯定要发芽的。

一个丧失了自信、自豪、自尊的民族，一个毫不计较人格、人品的民族，一个挨了一拳连哼都不敢哼的民族，必将被淘汰。世界民族之林中，没有它这么一棵歪脖子树赖以扎根的土。

#### 四

金敬迈是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图谋政变”为由被抓的。刚进秦城的头几年，没有人发给他如当年延安知识分子们整风必读的“学习文件”，而且不像那时多人关在一孔窑洞，是单人监禁。他与外界唯一的连通，是高高镶在墙上被铁栏分割成32块的一扇小窗。他要求看书，要求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

我要看书，我不能光听你们是怎么说的，你们说的这些我已经听够了，我还想知道“世界五百年出一个”、“世界一千年才出一个”之外的其他人是怎样认识世界、评价历史、理解人生和预期未来的。……我要的这点“自由”也不能给吗？你们怕什么呢？

无人理睬，他只能日日枯坐在那张直接放在地上的硬床板上，盯着那32块小天苦思冥想。他想出了眉目：害怕犯人看书的所谓专政，是弱不禁风的专政，是不堪一击的专政，是野蛮之至的专政。

后来有马列的书读了，他如饥似渴地看，看得那一双被打坏了的眼睛瞧什么都模糊一片，他只好放下书又开始想呀想啊：我是个人，一个活人，我不仅仅是个读书机。作为人，我要求得到人应有的起码待遇。在无法证明我罪当枪毙之前，你就得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即令我罪恶万端，早该五马分尸，那在您“分”我之前，也得把我当成一个人。……早在几百年前人们就已经确认：“人权天赋”。……当然，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一切做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又怎样呢，这能说明您伟大，您有力量吗？不。这只能说明您的虚弱，您的害怕和您的毫无自信以及这个时代的无比黑暗、无比野蛮和无比荒唐。

金敬迈在受难中思考，这思考让他的精神升华：

岂止是被关在单身牢房中的我？所有被抹杀了人的个性的人，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都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什么“工具”，什么“齿轮和螺丝钉”？“工具”能是人吗？“齿轮”、“螺丝钉”能是人吗！几千年来，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集中在对“人”的解释上，对“人”的日益尊重成为人类进步的尺度。人类是逐渐把人当成人的。只有奴隶主才一直把奴隶当成工具……

金敬迈悟出了自己是“人”而不是“工具”；认识到把人当作人，对人日益的尊重才是进步，而把人当成工具则是倒退到奴隶社会了。在这一点上，他比秦城监狱中关押过的许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要了不起得多。回归人性！有多少共产党的干部悟到了这点？

我知道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几乎所有的朋友，写了很多负面的外调材料。后来在整理父亲的旧日信件和日记中，又知道父亲在文革中也被要求写了很多的外调材料。虽然他要求自己实事求是，但是从未拒绝过写材料、有求必应，尽管有时实在无甚可写，搜肠刮肚地也要应付差事。而金敬迈不然，当中央专案组的外调人员让他在秦城写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时，他拒绝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者外，还有“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就是陈伯达。如果组长是骗子，那怎么看待这个“文化大革命”呢？揭发陈伯达，会不会误

伤“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揭发陈伯达，会不会成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不能揭，太危险。再说我没有什么可揭的。硬要我揭发，我觉得他这个“骗子”比有些“中央领导人”还多少强一些呢。

……中央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和骗子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能一夜之间就变过去，那说明他们如果不是同一流货色至少也相差无几。这就有点麻烦了。陈伯达“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混进党内少说也“凡四十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全党也未能识破他的真面目，那说明要区别一个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骗子，非常困难。是他隐蔽得太深，我们不易察觉呢，还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本来就不大，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一回事？还有没有别的“中央领导人”也是尚未被识破的骗子呢？往后平民百姓们怎么看待“中央领导人”呢，是先把他们当成骗子免得上当，还是宁愿上当，姑且先把他们当成中央领导人再说呢？或是既把他们看成是中央领导人又把他们看成是“刘少奇的一类骗子”呢？“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出现，确实带来一系列问题：骗子和领导人穿的是连裆裤，已经难解难分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今后还将时时遇到的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遭罪的是真正的“小小老百姓”。从今往后，他们还能信得过谁呢？把骗子当成了中央领导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把中央领导人当成了骗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照样没有好下场。反正老百姓啊，完了。

这是何等上乘的黑色幽默佳作！金敬迈参透了！

……我们现在正借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为名，大肆复辟封建主义。你就看看现在的“一言九鼎”、“唯我独尊”、“天无二日”，就明白我们在干什么了。

……什么“脱了裤子割尾巴”，什么“竹筒倒豆子”，把最见不得人的事“抖落”出来……都是主张人们不要尊严，不要脸的。……当你连自尊心都不要了，当你连脸面都不顾了，那么好了，你已经“脱胎换骨”了。这该是多么荒唐。

……硬要把人往死里逼、往疯里逼、往坏里逼，这算什么本事呢？重新做人？怎么重新做人？重新做鬼吧！

金敬迈拒绝做鬼，他要做人。他认为：“一个由连自尊心都没有了的人民所组成的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这样的民族能被世人瞧得起吗？”他在书中记述了如何为做人而抗争，他以命相拚，让那个将烟灰弹在他牢地板上的“领导”用手帕擦净它；他喂养过一只小老鼠，一只后来因天天放在“红宝书”上由绿变红的蚂蚱，两只跌落在放风夹道的地上凄凄待毙的小麻雀，他从这些小生灵的身上体恤着灵物的温暖和情感，让自己像个人一样地活下去，而不变成鬼！金敬迈了不起啊！还有什么比从“狗洞”中“走”着出来，保持了“人”的尊严和情感更让人敬佩的事呢！

## 五

刚解放时，金敬迈是个文工团的小演员，他说除了想演好英雄人物，对自己的一生没有太大的奢望。一本《欧阳海之歌》把他身不由己地推进了政治的漩涡，在里边蒙头蒙脑地跟着转了四个月零三天，还没找着漩涡的流向就灭了顶。他说：

我还是老实交待一下吧：我从未反对过谁。我是从基层来的一个小兵，我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根据去反对谁呢？原先我以无比钦佩无比敬仰的心情把您们看得无比神圣，后来，特别是这七年多来，当我明白了“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显得伟大，只因为我们自己正跪着。站起来吧！”



这个道理后，当我冷静地想了想后，我倒是很瞧不起一些人。从我那还没脱掉的胎，没有换掉的骨子里瞧不起一些人：凡夫俗子，不过尔尔，既不伟大，更不神圣。

这不是学者之言，这是个曾经被“伟人们”翻手招入近侧、又被他们覆手推入大狱，经过了“思考着”这一美丽境界的“小兵”，用双腿支叉起大写的“人”之后的实在话。这个觉醒了的小兵的认识质朴而彻底：

一个人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他的觉悟、修养、道德、学识，情操等等，而不是由他担任什么职务而定。人，如果不和他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分开，世界就麻烦了。世上还没有这样的椅子，谁一坐上去，水平马上就高了。

金敬迈在这里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知耻的民族，方能爆发出“后勇”的精神；一个由“人”而不是“工具”组成的自尊的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国家！

□ 原载《炎黄春秋》 2008年第6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